

毛泽东教育思想探源

主 编 孟湘砥

副主编 唐振南 孙海林

湖南教育出版社

要 做 人 民 的 先 生
先 做 人 民 的 学 生

毛泽东

毛泽东教育思想探源

主 编 孟湘砥

副主编 唐振南

孙海林

湖南教育出版社

毛泽东教育思想探源

主编 孟湘砥 副主编 唐振南 孙海林

责任编辑: 郑新吾 唐世伟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东风路附1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08毫米 大32开 印张: 9.875 字数: 250000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5355-1691-2/G·1686

定价: 8.0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绪论	1
上编 实践基础	
引言	17
第一章 潜心求学, 立志救国: 学生时代	21
第二章 革新教育, 改造社会: 教师生涯	51
第三章 革命家的初期教育活动	77
中编 思想渊源	
引言	97
第四章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选择与吸收	102
第五章 对西方文化的扬弃	130
第六章 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吸收与超越	163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的“洗礼”	195
下编 早期教育观	
引言	219
第八章 教育与社会改造	225
第九章 三育并重, 身心并完	241
第十章 学习(教育)与劳动相结合	256
第十一章 理论与实际一致	267
第十二章 提倡启发式, 反对注入式	284
第十三章 自动学习, 自力研究	291
结束语	307

绪 论

毛泽东青年时代选定教育作为他学习的专业，以后虽经过漫长的年月，但直到晚年，当他在 1970 年 12 月和美国记者斯诺长谈时，仍然没有忘怀自己毕生事业的这一起点。在 50 多年参与和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他早年所接受的教育思想，在实践中加以发展，且使之走向成熟。它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处理中国教育问题所形成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原理和中国的教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革命是长期、复杂、艰苦的，根据地和全国政权的巩固与建设也是全面的，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错综复杂的斗争，当然也包括了教育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升华。在观察教育问题时，由于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使他得以高屋建瓴地从全局的角度来审视教育的地位，断定教育的社会功能，充分发挥教育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并使这些结论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反复的验证。这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特点，也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极大优点。这种优点使他从不孤立地就教育论教育，而始终是从一个政治家、革命家、战略家、思想家的高度来把握教育，不断地给教育注入新的生命力，而没有沾染一点书斋式学者的迂腐气息。

这种孕育于青年时代，而在长期复杂的斗争中得到极大的丰

富和发展了的毛泽东教育思想，大体包括如下基本内容：

教育本质观：教育的本质是指教育本身所固有的、比较稳定的根本性质，它从整体上规定教育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就是毛泽东的教育本质观，这就是他关于教育和政治、经济关系问题的基本论点，对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毛泽东都是根据这个基本观点来进行考察的。

大革命时期，当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揭开了农村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而农民“大办其夜校”，以致文化程度迅速得到提高时，毛泽东曾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喜悦，为之高唱赞歌，并在广州、武汉等地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之培养干部，以推动包括农村新文化运动在内的整个农民革命运动的前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斗争极其残酷，条件非常艰苦。毛泽东就是在那种人间罕见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情况下，仍然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对于政治和经济的伟大影响和作用。他在1933年《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指出：“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当时，在苏区设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并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毛泽东并担任了苏维埃大学的校长。在抗日战争阶段，由于政治形势的发展和历史任务的转变，毛泽东及时提出要“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他说：“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全国解放前夕，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阶段上有关教育的论述可以说都是上述基本观点的演进和具体化。穿透层层历史帷幔和古往今来在这个问题上所积淀的种种思想迷雾，可以看到毛泽东舍弃了一切支节的纠缠与纷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切入了这个问题的实质。

教育目的论。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一个国家的教育的社会价值和功能实现的程度如何，往往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因而根据时代的要求，一个社会究竟要培养什么样规格的人才，就不能不始终居于全部教育问题的核心地位。毛泽东学生时代所主张的“三育并重”，“身心并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探求宇宙之“大本大源”，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以及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提出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都是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关教育目的的论述。当然，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就是在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时期内，情况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必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受教育者的才能和发展作更多方面的开掘，提出更丰富、更深入的要求，但这种规格的框架在毛泽东的教育目的论中已经建立。

教学论。研究教学论，必然涉及到哲学上的认识论；研究教学过程，也必然涉及到哲学上的认识过程。在西方的传统中，教育学历来隶属于哲学，西方教育界的代表人物如柏拉图、洛克、卢梭、杜威等，既是教育家，又是造诣很深的哲学家。东方亦然，中国历史上很多著名的教育家，往往也是从他们哲学上的认

识论出发来探讨教学过程的。这本来也不足为奇，因为无论是教学论还是认识论，它们在深层上是相通的，即都要涉及到世界的本源问题，涉及到世界的可否认识以及如何认识的问题。

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其它一些蕴含着深刻哲理的著作，为教学论的研究奠定了哲学基础。在《实践论》中，他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种认识真理的过程与教学过程的特点以及各类各科教学的实际结合起来，为总结人类教学经验提供了深刻理论依据，从中可以孕育出多种多样的教学结构、线路、步骤和模式来。毛泽东所提到的在教学中“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要通俗化”、“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等也就是这种原理在方法上的引申和具体运用。

学习方法论。理论联系实际；启发式；靠自学，“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这是毛泽东教育方法体系中的几根主要支柱，也是他从学生时代和教师生涯开始时一直到晚年都在坚持着的主张。毛泽东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讲话”。早在五四运动前后，他就在自己的学习与研究工作中，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认为“闭门读书，其学无用”，故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而且要读“无字之书”，所以，一面勤奋读书，一面利用学习和工作之暇四处“游学”实验。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他强调学友要为“改造现实社会”而求学，求“致用的学问”，同时主张每个学友不但要从事脑力工作，而且要从从事体力工作，“破除文弱之习惯，谋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湖南自修大学的教学宗旨就是“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后，经过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教育实践的检验，他更把这种学习方法推广

及于全党，主张按照这种精神来改造我们的学习，“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建国后，毛泽东关于教育工作的有些谈话和指示，如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和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所提到的“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农业和工业”等，同样渗透着上述精神，虽然有时有些矫枉过正之处。

办学论。这包括“两条腿走路”、选择校长和教员等一系列论述。中国土地辽阔，情况复杂，人口众多，在这种情境中办教育，毛泽东曾有过形象的比喻：办学要两条腿走路。这就是说在办学中要把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把国家办学和群众办学结合起来，把统一的教育目的和办学形式的多样性结合起来。我们既要有“阳春白雪”，又要有“下里巴人”；我们既要“雪里送炭”，又要“锦上添花”。毛泽东还曾生动地说过：戏，当然是梅兰芳唱得好，但大家都只看梅兰芳，不可能。所以草台班子的戏也要有。为了贯彻“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毛泽东还对县、区、乡三级学校的布点，对群众办学的形式以及分类教材的编写都作过原则性的论述。

上述毛泽东教育思想基本点的形成、发展与成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然而其发轫却渊源于他青年时代的学习生活和教育实践，渊源于他对早期所接触到的各种教育思想的主动吸收与选择。当然在这种吸收与选择中，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断，而不是别的什么决断，又与时代的需求、当时的文化教育背景以及毛泽东本人的个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毛泽东是在20世纪初叶度过他的青年时代的。当时正值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和约签定之后，距离鸦片战争已有六七十年，

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深入内地，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清朝政府腐朽透顶，中华民族的灾难是深重极了。1901年邹容愤笔书写了他在《清议报》上发表的《有感》一诗：“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1904年宋教仁写的一首长歌中有这样几句：“嗟神州之久沦兮，尽荆天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地，披发长啸而回顾兮，怅怅乎如何逝。”^①这些诗句表达了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人民特别是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愤懑、彷徨与呐喊。青年毛泽东的内心也无法逃脱这种时代大潮的冲击，而是怀着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进入社会，开始其救国救民之道的求索的。当然，当时这种求索，毛泽东也只能如恩格斯所论述的那样“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即从20世纪初期东西方文化在中国碰撞的基本格局中对各种材料进行比较、吸收与选择，而后才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批判与继承，以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所作的努力。

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这个问题在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求索中，是不能不占据首位的，这当然也是日夜萦绕在毛泽东心灵中的问题。在当时中国的政坛上，康梁维新派虽然已经衰落而让位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了，但在思想界，梁启超却还有相当重大的影响。洋务运动的失败和戊戌变法的厄运使梁启超对改革的认识也经历了由器物技艺到社会制度到文化心理的层次。他说：“以今日中国如此之人心风俗，即使日日购船炮，日日筑铁路，日日开矿务，日日习洋操，亦不过披绮绣于粪墙，饕龙虫于朽木，非直无成，丑又甚焉。”“今论者于政治、学术、技艺，皆莫不知取人长以补我短矣，而不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独身之有

^① 《宋教仁集》下册，第500页。

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①这就说明，梁启超已经认识到：人的近代化，是国家近代化的关键。梁启超倡导的开民智、新民德，献身思想启蒙，就是主张将社会变革放在千百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国民文化心理素质的提高上。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的。1912年，毛泽东投考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一中）时的作文试题是：民国肇始，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1913年春，毛泽东投考第四师范时的作文试题是：普胜法，毛奇谓当归功于小学教师，其故安在？由于毛泽东接受了梁启超的“新民之道”，思想上对此早有酝酿，因而均能一挥而就，以满分的成绩成了压卷之作。今天，我们能见到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文章最早的要算1912年上半年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写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了，毛泽东凭借春秋战国商鞅变法而欲取信于民的典故发挥道：“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毛泽东的全文约600字，而教师的眉批和总评却有150字：“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教师的评点也是很有眼力的。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把“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的原因，归之于人民的愚昧落后，显然这是他受到梁启超以教育为本位的社会改良

①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化》，1991年《新华文摘》第8期。

主义思想影响的痕迹。开发民智，提高国民素质，当然要通过教育，由此可见，当时毛泽东选学师范是有思想基础的。

挽救民族的危亡，开启民智，还必须通过教育造就一批社会中坚，这是当时中国实际的迫切需要。毛泽东少年时代，在劳动、学习和接触社会中，已深切感受到民族灾难的深重，逐渐萌发了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并由忧国忧民，而滋长了救国救民的抱负。他曾有感于“国家危亡，不能安心耕田”，决心到外地去求学，并改抄了一首诗送给他父亲，表达了自己立志求学和男儿志在四方的决心。1909年前后，当毛泽东读到《盛世危言》、《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等呼吁救亡图存的小册子时，这种认识深化了。1910年，他读了《世界英雄豪杰传》，对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历史功绩十分钦佩，感到中国也应有类似的人物来拯救民族的危亡。不久，他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子任”，表白了以“天下为己任”、以救国救民为自己崇高职责的决心。在第一师范求学的五年半时间里，他的这个志向更加坚定明确。他与志同道合的同学常引用顾炎武的信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互相勉励要成为“栋梁之材”。当然，无论是自己立志成为“栋梁之材”，还是塑造他人成为“栋梁之材”，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也还只能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教育思想家中来寻找自己的营养。

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积极面，非常强调人才的政治素质。其中，为人所广泛传诵的类似格言式的警句，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与屈原的忠君爱国思想和上下求索精神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圣君贤相、中兴名臣的事例，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学风，都曾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学习生活中产生影响。

今日保存下来唯一的一本毛泽东学生时代的《讲堂录》，是他1913年听杨昌济、袁仲谦讲课时的笔记，笔记的前面11页是屈原《离骚》和《九歌》的全文抄录，一笔不苟，正文的上面批有各节的提要，足见其爱好之深。《讲堂录》所记的范围很广，凡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以及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等，都有所涉及。也有许多处评论历史政局和人物，间或也论及到拿破仑、凯撒与福泽谕吉等外国的人杰。所读各篇，凡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都分条写出，间或杂以议论。这些议论多是治学和做人的道理，虽然均系老师的讲授，但却经过了他的认真选择和整理，从中也可以看到他当时经常思索的是些什么问题。

在谈论培养栋梁之材时，毛泽东非常强调探究宇宙的大本大源，强调立志的重要意义。1917年8月23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表达了这种见解。毛泽东自己立志追求“大本大源”，并力图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在强调立志与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受到了杨昌济的赞赏，给打了一百分。在身体锻炼方面，毛泽东青年时代有一套独特的方法。这一方面固然也是为了炼成强健的身体以担当重任，但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是为了锻炼自己百折不挠的意志力。例如，他的露宿，就是为了取得《书·舜典》中的“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体验。以上这些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刻意追求的个人及整个社会的道德完满境界以及注重“践履”的强烈的实践精神，可以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对此都有所接触、吸收，而后更作了充分的批判、继承。

在向西方探求真理方面，毛泽东1912年下半年在长沙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就有半年多的自修生活，浏览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著作。进入一师以后，由于他学习的是教育专业，因而这种探索更深入到了教育哲学和教育思想的领域，接触了卢梭、斯宾塞、罗素、杜威等人的著作。而当时

西方的教育思想亦面临着重心的转移，即由关心个人的发展转向对教育的社会政治功能的探求，关心于在大范围内利用教育去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文化面貌。关于这一点，杜威于1916年就宣称，他试图取得的是以“社会中共人的改造”作为教育革命的目标。他的欧洲的与美国的进步主义的同事们，以多种多样计划支持他的努力，诸如鼓励学生调查当前的社会状况，检查他们自己在社会中的作用，积累知识，培养优良的习惯和正确的态度，成为献身的负责任的民主主义者。

这种主张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认识相吻合，他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提出“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并于1918年春，在日本的武者小路笃实^①的影响下，就试图在长沙对岸岳麓山下设立“工读同志会”。同年夏季他从第一师范毕业后，又和几个同伴一道走访岳麓山下的许多集镇和村落，寻找实验的适宜地点。1919年春北游归来，他再次和同伴讨论了这件事。为此，他还草拟一个《建设新村的计划》。毛泽东提出的新村，是“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②作为通过教育以改造社会的基地。为使“世人耳目，咸集注之”，他要以此“新村”作为“模范村”，推而广之。

在接触这些著作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他的“三育并重”，“身心并完”的人才观以及个性解放和自我教育等主张。这一人才观的提出可以说是西方教育史上的思想精华与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精华在毛泽东身上的一次成功结合，是历史上教育思想在现代中国杰出人物身上的一次延续和创新。

① 武者小路笃实（1885—1976），日本人。于1918年在日本南部买了一块土地，建立新村，尝试一种公社式的生活。他的思想在《新青年》上作过介绍。

② 《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资料丛书》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在东西方文化碰撞、茫茫九派流中国的思想氛围中，青年毛泽东几乎是以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采取各种形式、各种方法来求索救国救民之道的，这包括搜览群书，实际考察，广交朋友，转益多师，甚至连短期来访的国际友人，亦不放过请教的机会。

例如，1917年春曾经帮助和支持过辛亥革命的日本人士白浪滔天（宫崎寅藏）亲临长沙，参加黄兴改葬的葬礼，毛泽东和同学萧植蕃（萧三）得知这个消息后，特地给他写了一封信，高度赞扬他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并表示“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的想望。

又如1920年10月，湖南省教育学会鉴于欧洲战后，各国教育思潮激烈大变，而湖南僻居内地，自应急顺世界之潮流，藉促学界之进步，因而邀请世界哲学及教育大家杜威夫妇、罗素等来湘讲学。杜威讲了三场，题目包括教育哲学、学生自治、教师乃指导者等，毛泽东出席听讲，并担任了记录。

对于这种寻求真理的迫切心情，毛泽东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作了生动的描绘。他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①这里描绘的既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学习心态，当然也是毛泽东本人的心态。

在20世纪初叶的历史背景下，为了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青年毛泽东的心境是极不宁静的，思想上的变化与震荡也是迅速的、激烈的，他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

今日之我挑战。”而这正是一个求索者的极可宝贵的品格，因为一个真正的求索者是无法按捺自己思想的跳跃与躁动的。

1920年秋冬，就是在这种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的焦灼心境中，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而对于教育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根本性的转变，导致他对教育其它方面的看法也有了新的出发点。此后，在这种新观点的引领下，再经过实践和理论上的升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体系在1927年前后得以初步成型。至此，正如同生物在个体发展上重现其系统的主要发展阶段一样，毛泽东的早期思想发展也经历了两千年来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所走过的主要路程。

“哲人其萎兮”。现在，毛泽东个人已走进历史，但毛泽东思想还留在人间。中国和世界是不会忘记这个历史巨人的。今天，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来探讨毛泽东教育思想形成的渊源，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就在于缅怀这个历史的巨人，研究七八十年前，他如何在民族灾难极其深重的历史背景下比较、分析、鉴别各种教育流派，“挈其瑰宝，绝其淄磷”，而终于选定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中国教育问题的理论武器，从而批判各种既有的教育思想和材料，又吸收其中合理的内核和片断，成为构建思想大厦的砖瓦，并给它们注入新的生命力；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在教育事业的规模更加广阔，内容更加丰富，问题更加复杂，形式更为多样的情况下，如何掌握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精髓，坚持正确的方向，建设好教育这一整个社会的奠基工程，从而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教育思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毛泽东教育思想指导了我们的工作几十年，今后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中，我们仍然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当然与历史对

比，今天的情况已有很大变化。

今天，由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对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影响更为重大了。面向未来，21世纪将是一个更加深刻变革的时代，教育在孕育和形成这种变革中会起日益重要的作用。现在，世界历史的演变已经发展到这一步，教育所充当的角色，已由19世纪的灰姑娘变成了20、21世纪中足以左右国家命运的女神。

今天，教育的内容也无比地丰富了，形式也无比地多样了。家庭教育、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所组成的网络可把一个国家的全部人口覆盖在内。一个人终身只受一次教育的时代已经结束，“活到老，学到老”正在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现实。

当前，教育面临如此复杂的形势，担当如此严峻的任务，我们需要理论武器。这武器必定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因为它滋生成长于中国的土壤，贴近中国的实际，经过历史的考验，深入到亿万人民的心灵。因而近些年来，经过反思，人们中出现的毛泽东热就绝非偶然的事情。思想界所曾出现的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特热虽可喧嚣于一时，但中国的国情决定这些人的学说只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匆匆过客。他们的某些合理内核和片断可以吸取，但只能作为一种佐料，而绝不会成为中国人民精神上之主食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毛泽东思想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成了一个初步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后也一定能够依靠毛泽东思想，按照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更加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教育方面也一定能够依靠毛泽东教育思想，充分发挥教育的能动作用，进一步促进我国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

毛泽东教育思想有一个孕育、发展与成熟的过程。在毛泽东教育思想孕育的阶段中，可以找到它以后各种成熟观点的胚胎。